

身体在场·形塑化身·共时展演： 真人主播及其“数字孪生”的人-技关系

郝君怡 周 勇

摘要:“数字孪生”人工智能主播将播音员主持人首次引入媒介技术生产场域,使这一媒介角色首次与人工智能技术产生了直接的身体关系。通过对作为数字孪生人工智能主播原型的播音员主持人及播音主持专业人才进行深度访谈,一方面可部分揭开数字孪生人工智能主播生产过程的“黑箱”,一方面能展现真人主播与其数字孪生人工智能主播之间身体在场-形塑化身-共时展演三个阶段身体关系的演变。播音员主持人的劳动场域向上游拓展,通过具身劳动成为一定意义上的技术建构者;但人工智能技术以去主体化为目标,造成了技术化身与原型的离身性关系,真人主播的身体困境问题显现。双方共时在场进行主持传播活动实质上是对社会技术想象的迎合和建构,回归理性才是人工智能主播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数字孪生;人工智能主播;身体;人-技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3)02-0017-09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AZD060)

近几年,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业界的应用已经深度渗透到新闻采集、编辑、分发的一系列生产流程之中。不同于其他智媒技术,人工智能主播承担了人格化信息传播中介的角色功能,在呈现形式上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属性和拟主体性。这其中,尤以真人驱动的数字孪生的应用最为广泛,自2018年新华社推出被冠以“全球首位AI合成主播”之称的人工智能主播“新小浩”后,中央级媒体以及各地市融媒体中心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数字孪生人工智能主播(以下简称“数字孪生AI主播”),如人民日报AI虚拟主播“果果”,央视新闻客户端虚拟记者“通通”,江西新闻客户端“悦悦”等,助推了数字孪生AI主播的现象级应用浪潮。数字孪生技术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对物理实体对象的特征、行为、形成过程和性能等进行描述和建模的过程和方法,数字孪生技术所生成的数字孪生体是与现实世界中的物理实体相对应的虚拟模型,可对实体进行模拟。^[1]数字孪生概念的提出可追溯至2003年Grieves教授提出的“镜像空间模型”^[2],随后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应用发展迅猛。不同于动画形象的虚拟主播,数字孪生的形象特征与行为特征源自于对自然人的模拟,在当下的传媒组织现实应用中多以传媒组织中的员工(播音员主持人、出镜记者)或技术公司招募的播音主持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模拟对象,即“原型”。也因此,数字孪生AI主播的出现,将播音员、主持人、出镜记者等主持传播角色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物生产的场域,主持传播这一与传媒深度绑定的工种首次参与到人工智能技术物生产建构的劳动之中。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在信息系统“黑箱化”之后,“过程”就会难以回溯^[3],因此及时展开技术物的生产过程对于理解

技术社会至关重要。虽然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技术研究中人与技术的关系始终处于“元问题”地位,但在新闻传播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的人-技关系讨论中,大部分还是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作已完成的技术产品,探讨其对于接受端——个体用户、媒介组织机构、人类社会的影响。而以微观视角聚焦人工智能主播与播音员主持人间关系的既有文献大多将二者视为竞争关系,关注人工智能主播对于传统主持传播职业角色的挑战与促逼,忽略了更早期二者间关系的形成与变迁。实际上,作为“建构者”的人和作为“使用者”的人,都是与技术(物)产生关系的主体,不应太过偏重,技术物生产环节的人-技关系值得进一步发掘。

具身性(embodiment)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成为哲学以及认知科学所关注的焦点,强调“肉身化的主体”,将身体作为认识和体验物质世界的基础,人的主体性通过身体与世界的物质性互动而实现。^[4]随着新技术引入传播实践,身体问题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但当下传播学的身体研究大多从媒介消费的视角出发,探讨新技术语境所带来的新的身体形式^[5],以及新技术对媒介使用者的具身性影响^[6-7]。相比之下,由于多数新媒体技术及其物质性载体的生产过程仅仅面向专业技术从业者展开,对于大多数非专业技术人员而言则是事中难以参与、事后难以回溯的“黑箱”,因此媒介生产的身体研究尚留有较大的研究空白。但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生产存在其特殊性,即播音员主持人这一传媒角色不仅“将物质化的技术或人工物融入到身体经验之中”^[8],还将自身的身体经验主动凝聚于技术物并向用户显现。在这一语境之下,具身性可以被理解为播音员主持人参与技术生产的方式,也成为研究生产场域数字孪生 AI 主播人-技(人机)关系的一个切口。

综合以上背景,本研究将媒介生产场域中的人-技关系作为核心关切,将具身性作为理论切口,探讨数字孪生 AI 主播与其原型之间的人-技关系。真人主播在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生产过程中进行了怎样的具身实践?二者之间存在着怎样动态发展的身体关系?本研究将通过管窥数字孪生 AI 主播生产的“黑箱”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索,并对真人主播与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现实问题与未来路径进行讨论。鉴于此,本文聚焦于数字孪生 AI 主播与真人主播产生关系的三个阶段,从身体的视角出发探讨此间播音员主持人与人工智能主播之间的人-技关系。

(二)研究方法

为深入探查作为技术产品的数字孪生 AI 主播与真人主播之间的人-技关系,本研究主要采用访谈法,对五位作为原型参与到数字孪生 AI 主播生产的播音员主持人或播音主持专业人才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单次访谈平均时长约 60 分钟,并依据受访者要求对部分受访者信息作匿名处理。受访者基本信息见下表。

表 1 受访者信息简表

代号	岗位	所属单位
受访者 A	新闻播音员	中央某媒体
受访者 B	出镜记者	中央某媒体
受访者 C	新闻播音员	中央某媒体
受访者 D	TTS 部门声音训练师	某科技公司
受访者 E	播音主持专业在校生	中国传媒大学

二、身体在场:真人主播生物性特征的转移与嫁接

数字孪生技术是以现实世界的物理实体为对象在虚拟空间的要素重建。在当下的技术生产模式中,数字孪生作为播音员主持人在虚拟空间中的映射,其生产建构的第一步是对其模拟对象进行

数据采集,这一生产环节需要播音员主持人的身体在场。

我作为服务于技术公司的训练师,会事先与技术工程师沟通确定产品需求,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引导、监督被采集者向产品需求靠拢。比如我们要做一个新闻播报的 AI 主播,就需要被采集者的服饰、神态、声音、语气等符合新闻播音员的基本样态。(受访者 D)。

采集过程分为三部分:一是身体建模,在专业拍电影的影棚——一个四周都是相机的“笼子”里立体化地采集信息,要像录电影的武打特效一样穿上紧身衣,身上大概要插上数百个采集点,身体动作会被数据点采集出来。二是面部表情采集,面部表情比肢体还更要细致一些,在脸上有很多数据点,一个机器对着我的脸,通过让我播读特定文本及直接要求我做出如惊讶、微笑、眨眼、闭眼等各种表情收集表情数据,这样 AI 主播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做出各种表情了。最后是声音采集,与 2D AI 主播相一致。(受访者 B)。

在关系形成发展的第一阶段,播音员主持人需提供自身的音视频数据作为机器学习的训练依据。目前的视频采集过程根据人工智能主播的最终呈现形态为 2D 或 3D 而略有不同:人民日报“果果”和新华社“新小浩”等属于 2D 形态,通过专门的音视频采集辅以其日常出镜播报的音视频素材即可完成数据库建立。而以“新小微”为代表的 3D 形态则需要更为复杂的电影级数据采集方式完成对身体的建模,通过穿戴覆盖采集点的特制服装将身体转换为相应的关键帧数据。在数据采集过程中,真人主播是数字孪生基本生物学特征的来源,彭兰将其称为“人的数字化重组”,通过对真实人物“元件”的获取、优化和整合,创造出新的虚拟“生命体”。^[9]随着技术迭代,数字孪生 AI 主播对于真人主播生物学特征的复刻已经逐渐从“栩栩如生”走向“真假难辨”。

正如“新小浩”“康晓辉”“小小撒”等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命名大多取自其原型的姓名,播音员主持人在数据采集阶段的身体在场,既赋予了数字孪生以“虚拟肉身”,又为数字孪生提供了社会身份。如央视频 2022 年推出的“AI 王冠”力求基于对真人样貌的还原实现超自然仿真^[10],数字孪生 AI 主播无论在肉身的外在表现形式上还是交流符号的使用特征上都脱胎于真人主播。当智能主播的呈现样态与原型无限贴近时,可能会被感知为从属或等同于其原型,二者的身体无法被割裂看待。由此,作为原型的播音员主持人的具身实践赋予了数字孪生走入人类社会的社会位置,并使数字孪生 AI 主播获得主持传播应具有的人格化特征。

“对人类心智、身体与世界的日常交互进行模拟、仿真甚至于再造,这个过程仍要以具身性为其经验基础”^[8],真人主播的身体在场彰显了主体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动作用——从身体经验出发,帮助技术建构了身体,形成对技术的驯化。“在数据采集实践中我就是在动用在校学习的播音主持专业知识,调动镜头前的新闻播报状态。”(受访者 E)在身体在场的生产实践中,作为原型的播音员主持人动用了经由具身认知所形成的身体经验、与外部世界互动而固定下来的行动逻辑和职业行为的“前台”表演状态,从而弥补了技术物自身无法实现具身认知的技术路线缺憾,建构了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拟主体性。同时,相对于纯粹基于动画生成的人工智能主播,真人主播的具身实践也部分纾解了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身体的无机化危机。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尤其以智能机器人的完美形式与超强智力形态为终极发展目标,将会对人的身体予以抽象化抹平或贬低”^[11],播音员主持人的具身实践使数字孪生 AI 主播不再是技术与想象所建构的“空中楼阁”,而是拥有了物理世界的实体根基。再有,自然和人类社会多元要素作用之下的身体部分消解了人工智能工业的高效率自动化生产对于规律和模式的遵循,使人工智能主播技术物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本·雅明所推崇的灵韵(Aura)。

虽然真人主播以身体在场的方式对数字孪生 AI 主播施加了建构性的作用,但真人主播的身体是受到技术现状、项目需求、应用场景等规训的身体,其主体性的彰显程度还值得进一步商榷。由于当下的人工智能发展还处于统计学习阶段,数据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要求播音员主持人在身体在场阶段时刻维持在某一区间内的相对稳定状态,基于给定的场景和文本完成既定动作。为保证数据的质

量和清洁度,音频数据与视频数据通常会分开采集,标志着身体实践行为被人为剥离,一分为二^[12],身体的物化隐匿其中,主持传播活动由“情感劳动”转化为“技术劳动”^[13]。真人主播通过动用播音主持专业实践中最为传统、规律的部分,呈现播音员主持人工作行为的前台表演状态,以迎合社会(尤其媒介机构与科技公司)所预设和期待的形象与行为,主持传播中涉及人文关怀、临场反应的部分则被忽略。

三、形塑化身:算法技术及其逻辑下的传播去主体化

不同于社交网络场景下的数字化身(avatar)本质是身体的“远程在场”^[7],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赛博格身体”将技术物吸收为身体的一部分,智能主播技术是以主体离场缺席为目的所构建的独立于主体的存在。虽然有学者认为数字孪生的“分身主播”是真身的代理人(Agent),属于镜像世界中的分身在场^[9],但实质上,数字孪生 AI 主播无法代理真身的心灵,反之达成“去主体化”才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功能目标。人工智能一词在 1956 年的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 Conference)中被提出,并在会议项目提案中如此描述:“该研究基于一个假设,即学习的每个方面或智能的任何特征在原则上都可以精确描述,以便可以使机器模拟它。尝试寻找如何让机器使用语言、形成抽象概念、解决人类的各种问题并自我改进”,并提出“使机器采用人的行为方式行动就称之为智能”。^[14]通过溯源人工智能概念可知,人工智能技术的终极目标即是实现对于人类主体性的(部分)替代。

“对于我个人而言,数字孪生 AI 主播留住了我 40 岁之前的样貌和声音”但“它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它做它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受访者 A)。经历了身体在场的数据采集阶段,真人主播与其数字孪生 AI 主播之间的身体关系步入“离身离场”阶段。后续生产活动由技术及技术人员“接棒”,将播音员主持人的身体数据进行分类、定序后再进行分析、学习和重组,最终形塑出一个去主体化的技术物化身。

梅洛-庞蒂指出,身体是认识的主体。波兰尼提出“通过寓居而认识”(knowing by indwelling),认为“人类心灵本质上是身体化的,它活动并寓居于身体之中”^[15],反映了学者对身心一体的紧密联结关系的认同。与之相反的是,在数字孪生 AI 主播生产的形塑化身阶段,技术生产致力于实现的是智能主播技术物的去主体化,即以“化身”替代具有主体性的身体,从而实现身-心分离,促使我们在算法构筑的虚拟世界中重新审视“身体”的含义。不同于以动作捕捉技术为核心驱动的虚拟主播最终倚赖其背后的“中之人”^①的表演,以人工智能技术物行动的底层逻辑是算法技术。尽管有学者提出智能超仿真实体有望实现从“媒介即人体的延伸”到“媒介即人”的转变^[16],但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当下阶段,人工智能主播的主体性还仅仅是技术乐观主义的一种美好期许: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意识塑造基于表征模拟而非心理活动。约翰·赛尔认为外在符号源于心理的表征,而人工智能理论却反过来通过运用符号的模拟赋予人工智能“人”的心智特点^[17],因而建立在表征而非源于心理的数字孪生 AI 主播无法具备与人类同等的心智能力。其次,人工智能主播的意识塑造具有不完全性。符号只是人类心智的外在表征而非完全表征,例如数字孪生 AI 主播生产中所承袭的语流、神态、肢体动作等都只是人类心智的不完全投射,由此建构的化身并不能完整展现人思想情感动态的变化过程和信息交流符号的混合模态。

人工智能主播的心智塑造呈现“一身多心”特点的原因,除基于数据和算法的表征之外,更受到社会组织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影响。“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性格或者说个性特点其实并不源自它的真人原型,而是源于节目或者说团队的赋予”(受访者 A)。就内容生产方面来看,目前已落地一线应用的人工智能主播播报的内容或来源于人工采写,或联结智能新闻写作等功能模块而实现一体化自动内容生产。无论是前者的“编辑室大脑”基于的多工种组织联动(如新华社“新小浩”等),还是后

^①“中之人”来源于日语“中の人”,指操纵 vtuber(虚拟主播)进行直播的人。

者的“数智大脑”基于对社会知识的大数据学习(如红棉小冰与每日经济新闻打造的“N 小黑”等),实质上并非个体行动的结果,而是直接或间接对多元异质主体所生产信息的获取。经过复杂且透明度低的内容生产机制之后,由人工智能主播的终端呈现出发去溯源内容主体、辨明主体行动与算法行动就变得愈发复杂。在如此“一身多心”的逻辑之下,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具身认知则来源于多主体在各自情境中活动而生成的认知,其心智并非隶属于其原型或其他单一主体,而是来源于人类社会广大的知识文化的创造者,其身体仅仅是一副工具性、物质性的躯壳,用以承载其他主体的行动。正如有学者预测未来将出现“增强人类”^[18],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认知模式有助于使其尽可能规避单一个体在身体与环境方面局限所导致的认知窄化,达到“群策群力”的效果;但与此同时算法“0-1”的表达制式决定了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认知必然受限于固化的认知模式和扁平化的行为表达,与“人类的身体经验本身是直接的、有意义的结构”^[19]相矛盾,最终导致数字孪生 AI 主播所体现的人类认知的意向性被削减。

四、共时展演:技术想象建构与媒介技术玩具

在技术生产完成后,数字孪生 AI 主播作为技术产品进入传媒组织的应用场域。在传媒组织的常态化应用中,人工智能主播除承袭了原型身体的生物学特征之外与原型并不产生新的关系连接。但在媒体的策划性活动中,真人主播与数字孪生 AI 主播时而以“同框”的方式出现,利用真人与化身同框出现所带来的视觉震撼达到吸引关注、制造话题的效果。如 2019 年央视网络春晚撒贝宁与“小小撒”的同台主持,以及央视频于 2022 年两会报道中推出的“‘冠’察两会”中以主持人王冠与“AI 王冠”同屏的形式“为两会报道注入科技‘创新力’”^[20],此类数字孪生 AI 主播与原型的同框属于特别策划、有意安排的结果。这一阶段真人主播与数字孪生 AI 主播之间表现为共时展演关系。

我和我的数字孪生 AI 主播做了几次配合,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论坛活动上,AI 主播会先出场做一个背景介绍,再把我引出来,我俩做一个对话。或者我抛出一个问题,然后 AI 主播来解答一下,之后把下面的嘉宾引出来,我俩的搭配就是类似这种串场。因为没办法(与 AI 主播)直接沟通,所以都是提前设定好的问答内容。(受访者 C)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已经具备一定水平的即时交互能力,但其在“鸡尾酒会”问题、多轮对话、理解周围世界等方面难以克服的技术壁垒导致这一功能存在不可控的风险,难以在大众传媒中应用。而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的是,传媒组织着意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宣传活动中凸显人工智能主播的这一功能特性,通过对台本的预设计模拟播音员主持人与其数字孪生 AI 主播之间的即时互动——在语言上进行问答与承接,在副语言上进行面部神态与身势语的交流。“其实 AI 主播在进行现场采访的时候,是由我在背后穿着动作捕捉的衣服,由我来做动作、来说话,这不属于人工智能驱动的方式。”(受访者 A)这与其说是对于智能技术传媒组织应用的一次展示,更不如说是社会及传媒组织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面的一种现实需求和未来期望的表达。

真人主播与人工智能主播的“互动”限制了其能动性的发挥,将主持传播去深度化和形式化为按照既定文本框架的展演行动。这一“展演”与消费社会情境相关联,营造了一种消费文化的幻象,以实现供大众消费的官能快感为主要目的,向受众建构一个“人工智能技术身体”的神话。如此展演所表征的技术价值已经超脱了数字孪生 AI 主播当下所能达到的使用价值。根据保罗·莱文森的观点,任何媒介技术在初生阶段都是作为“玩具”进入社会之中,“人们喜欢它们,是因为好玩”^[21],而非出于技术的工具性导向,“现阶段的 AI 合成主播尚未成为新闻生产流程再造的工具,反倒更像是一个新奇的‘媒介技术玩具’”^[22]。处于玩具阶段的数字孪生 AI 主播,技术的功能价值难以彰显,技术本身比技术结果更加引人关注,数字孪生的形态和共时展演的形式更加刺激了受众的感官愉悦。在消费社会中物因其与其他物之间的差异性而被消费,即“它被消费——但(被消费的)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它的差异”^[23]。真人主播与其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共时在场看似展现了二者的同一,实质上

强调的是二者的差异,身体外在形态的相似增强了人与技术物本质差异的鲜明度,向普罗大众强调了主持传播主体“由人到物”的演变。

如上所言,真人主播与数字孪生 AI 主播之间的共时在场实质上是依据台本预设的一场展演,带有鲜明的消费主义色彩。将播音员主持人的身体与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身体转变为符号化的身体,作为指涉传媒技术进步的符号,共同建构了人类社会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想象。

五、余论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驻重塑了传播学的疆域和边界,其中就包含有身体研究的知识更新和视向转换。唐·伊德在其“三个身体”理论中划分出“技术意义上的身体”,提出技术意义上的身体是在与技术的关系中通过技术(技术人工物)建立起来的身体,强调了技术与身体之间的双向建构作用。技术正在不断地入侵身体世界,正在持续地塑造新的身体^[24],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技术的语境之下,作为原型的播音员主持人被卷入其中,主持传播角色从媒介内容的生产者,转变为媒介(技术物)的生产者,在三个阶段:身体在场、形塑化身、共时展演中产生身体与技术之间的关联。关注真人主播与数字孪生 AI 主播之间的身体关系,是新闻传播学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不应忽视的课题,上述的三个身体关系的演变阶段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播音员主持人与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现实境遇与未来发展:

(一) 播音员主持人劳动场域向上游延展

如果将视听内容的生产视作一条工业流水线,那么播音员主持人作为“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群体观念,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驾驭节目进程,直接面对受众,平等进行传播”^[25]的传播角色,一直以来都居于最靠近受众的视听传播的终端环节。而数字孪生 AI 主播这一技术产品的传媒应用,直接将播音员主持人引入传媒生产流程的早期阶段,打破了传统传媒内容工业化生产之下相对固化的分工,甚至使其从传播角色“破圈”而成为一定意义上的技术建构者,播音员主持人从技术顺从的接受者,转而拥有了直接影响技术的权力。数字孪生 AI 主播造成的播音员主持人劳动场域向上游延展,提示对人-技关系(或人机关系)的研究对技术物生产者的劳动给予观照。

传统主持传播活动基于播音员主持人“理解稿件—具体感受—形之于声—及于受众”^①的创作过程,结合马克思的劳动思想来看,传统主持传播活动属于播音员主持人发出的一种“活劳动”(living labour),活劳动即“‘具身’(或‘寓身’‘涉身’)的劳动,是由人的身体发动并以其为载体所进行的劳动”^[26]。而在数字孪生 AI 主播语境下,播音员主持人的主持传播行为发生于数据采集阶段,属于“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当数据采集环节的活劳动凝聚并固化于技术物内部,就转变为“死劳动”(materialized labour),作为过往劳动被物化呈现,成为下一阶段人工智能视听新闻的生产条件(或称劳动工具)。因此应注意到,数字孪生 AI 主播造成播音员主持人的劳动场域向上游拓展的同时,也蕴藏了播音员主持人下游劳动场域压缩的后果。播音员主持人的上游劳动主要通过体力劳动赋予技术物规律性的身体经验,因而在下游劳动中体力占比高的部分开始被离身性的 AI 主播所分担,这是对身体价值的侵占,同时也是数字化时代信息流传播需求下对人体力的一种解放,促逼播音员主持人在下游劳动中发挥更多心智价值。

(二) 数字孪生“原型”的身体困境问题显现

“数字孪生”成为 AI 主播业界应用的主要技术形式,是对“身体是技术的源泉和存在的场所”^[27]的体认,表明传统主持传播的“人格化”内核在智能传播中得到延续,说明了建构身体间性对于智能体主持传播行动的进行具有重要意义。播音员主持人为数字孪生 AI 主播提供了生物学特征和社会身份,将以虚体形式存在的人工智能技术物实体化,使技术物的社会性得以确立。但同时,播音员主持人也被驱使着卷入一套新的生产体系当中,负载了新的角色功能,由此而来的是播音员主持人的

^①此为播音理论中对于播音创作道路的表述。

身体困境,主要包括主体性危机和权责问题两个方面。

首先是主体性危机。学界对人工智能技术所引发的主体性危机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技术对于人类思维、能力的模拟能否使技术物在人类社会中拥有主体地位,二是人工智能技术物是否会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挑战。以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水平来看,以上两点忧虑对于主持传播领域而言还为时尚早。当前表现突出的主体性问题体现为作为原型的播音员主持人在人工智能主播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异化问题。数字孪生消解了身体与技术物之间的边界,身体或身体部位成为被异化的消费对象。播音员主持人进入人工智能主播的生产场域之中,受制于技术的驯化作用,通过克制自身主体性的发挥以迎合技术物的生产标准和生产规则,并在具身劳动结束后失去对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控制权,使得这一技术物不再是播音员主持人所使用的工具,而是异化于身体的与之相对立的存在——“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28]

其次是权责问题。权责问题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责任主体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物的权责问题已经成为法学、伦理学等学科研究的争议性课题。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技术复杂性使其对一般公众而言成为难以解释的“黑箱”,加之脱胎于自然人的生物学特征,容易使公众将其视为其原型的从属,造成责任主体的失焦。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提升,会进一步对播音员主持人的声誉管理构成挑战。二是形象权问题:在被访者中,多数体制内的播音员主持人将对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身体元件赋予视作“职务行为”,媒体并未为此与播音员主持人签订形象权相关的条约;多数直接面向科技公司的播音主持专业人员表示并不知悉技术公司如何保护其身体数据,数字孪生 AI 主播与原型身体的紧密联系导致个人声音权、肖像权、形象权等法律范围内的人格权问题凸显——传媒机构使用其员工的身体特征用于自动化内容生产是否属于员工的工作职责范围?需要签订怎样的协议来明确使用的边界?将数字孪生 AI 主播用于生产大量公开的内容,是否会产生形象盗用等技术风险?数字孪生 AI 主播身体的性质属私人还是公共?这一系列问题亟待被置于技术、法律、伦理、传媒经营管理等多个语境中进行商榷。

(三) 回归理性是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播音员主持人与其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共时在场应用于传媒组织策划宣传的大型活动和特别节目中,通过建构“奇观”展现人与人工智能身体的相似性和本质的差异性,满足大众的官能快感并建构社会对高新技术的想象。然而基于技术新鲜感的热潮总有退去的一刻。回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历程,从 1956 年至今已经历三次发展热潮和两次低谷,每一次低谷都关联了社会期望与技术现实局限之间的落差。

在共时展演阶段,播音员主持人与本已离身的数字孪生 AI 主播发生身体的共现,为受众描绘一副主持传播人机协同的图景。播音员主持人身在其中,被裹挟着以表演的方式强调 AI 主播即时互动、现场反应等在事实上居于短板的能力,实则是迎合科技公司、传媒机构和受众三方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期许,是一种“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非理性主义和技术浪漫主义的表征。但当我们从对技术的迷狂中抽离就会发觉,当下的共时展演只能用于偶发的“特别节目”,不仅无法实现常态化应用,也难以发挥 AI 主播作为技术工具在自动化量产方面的优势,更要警惕社会由此而滋生的期待泡沫。当浪潮退却,感官倦怠袭来,数字孪生 AI 主播的可持续发展还应当依靠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回归。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范畴最早由马克思·韦伯提出,其中前者强调行为目的的达成,后者强调行为过程的意义。着眼当下, AI 主播发展的现实路径应当由建构想象回归工具理性。作为技术生产者和使用者的科技公司和传媒组织应当重新评估人工智能主播的功能优势,以合目的的可常态化应用为基本导向,为视听内容的生产传播“降本增效”。面向未来, AI 主播的发展则应当着眼于价值理性。通过努力突破存在于 AI 主播中的身、心二元壁垒,寻求技术物拥有具身认知的可能,使 AI 主播突破现有的工具性角色和单一、被动的符号化身体样态,在数智化时代承担更强的建构性作用。

参考文献:

- [1] 庄存波,刘检华,熊辉等.产品数字孪生体的内涵、体系结构及其发展趋势.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7,4:753-768.
- [2] M. W. Grieves.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the New Paradigm for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 Development, 2005, 2(1-2): 71-84.
- [3] G. C. Bowker, S. Timmermans, S. L. Star. Infra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Classifying Nurses' work//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hanges in Organizational Work. Springer, Boston: 1996: 344-370.
- [4] P. Fusar-Poli, G. Stanghellini. Merleau-Ponty and the "Embodied Subjectivit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2009, 23(2): 91-93.
- [5] 於春.传播中的离身与具身:人工智能新闻主播的认知交互.国际新闻界,2020,5:35-50.
- [6] 黄华.身体和远程存在:论手机屏幕的具身性.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9:46-51.
- [7] 谭雪芳.图形化身、数字孪生与具身性在场:身体-技术关系模式下的传播新视野.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8:64-70+79.
- [8] 刘海龙,束开荣.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80-89.
- [9] 彭兰.智能时代人的数字化生存——可分离的“虚拟实体”、“数字化元件”与不会消失的“具身性”.新闻记者,2019,12:4-12.
- [10] 央视视频.央视视频科技赋能想象再出猛招,“AI王冠”带来新型主持人猜想.2022-03-10.[2022-06-15] <https://m.itouchtv.cn/article/991e34f579905fa304b847c2931b84ce>.
- [11] 何光顺.身体技术演练中的感知觉回归——从庄子视角看技术的肉身性与人工智能的未来.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99-111.
- [12] 郝君怡.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虚拟主播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
- [13] 薛翔,杨航.新技术实践中的“身体”:理解主持传播的智能主体.新闻爱好者,2020,7:59-62.
- [14] J. McCarthy, M. L. Minsky, N. Rochester, et al. A Proposal for the Dartmouth Summer Research Projec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gust 31, 1955, AI Magazine, 2006, 27(4): 12-12.
- [15] 郁振华.身体的认识论地位——论波兰尼默会认识论的身体性维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72-80.
- [16] 林升梁,叶立.人机·交往·重塑:作为“第六媒介”的智能机器人.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10:87-104+128.
- [17] 时玉珍.社会化机器人普及对人类情感观念的影响探析——基于伊德技术现象学视角.现代交际,2019,18:249-250.
- [18] A. Faiola, A. E. Voiskounsky, N. V. Bogacheva. Augmented Human Beings: Developing Cyberconsciousness. Voprosy Filosofii, 2016(3): 147-162.
- [19] 李恒威,盛晓明.认知的具身化.科学学研究,2006,2:184-190.
-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视频.真人和虚拟人同屏播新闻,总台首个AI超仿真主播为两会报道注入科技“创新力”.2022-03-08.[2022-07-06] http://news.cnr.cn/native/gd/20220308/t20220308_525760055.shtml.
- [21] 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千纪指南.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60.
- [22] 易艳刚.作为“玩具”的AI合成主播.青年记者,2019,3:112.
- [23]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5.
- [24] 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国际新闻界,2018,12:83-103.
- [25] 高贵武.主持传播学概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1.
- [26] 肖峰,杜巧玲.活劳动:从人工智能到脑机接口的迷思.江汉论坛,2022,8:39-46.
- [27] 孙萍,李云帆,吴俊燊.身体何以成为基础设施——基于平台劳动语境下外卖骑手的研究.新闻与写作,2022,9:28-38.
- [28]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31.

Body Presence-Shape Avatar-Co-Time Exhibition: the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 Broadcaster and “Digital Twin” AI Anchor

Hao Junyi(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Zhou Yong(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twin" AI anchor introduces the broadcaster to the media technology production field and brings this media role into a direct body relationship with AI techn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By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broadcasters and broadcasting professionals who are the prototypes of digital twin AI anchors, this study partially unveils the "black box"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digital twin AI anchors, and shows the evolution of the bodily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 broadcasters and their digital twin AI anchors in three stages of body presence, shape avatar and co-time exhibition. The field of labor of the broadcaster expands upstream and becomes a technical constructor in a certain sense through embodied labor. Howev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ims at de-subjectification, resulting in a disembod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chnical avatar and the prototype, and the problem of the real broadcaster's bodily dilemma emerges. The co-presence of both parties in hosting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is essentially catering to and constructing the socio-technical imagination, and a return to rationality is the sustainable path for digital twin AI anchors.

Key words: digital twin; AI anchor; body;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hip

■ 收稿日期: 2022-08-05

■ 作者单位: 郝君怡,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北京 100024

周 勇,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北京 100872

■ 责任编辑: 刘金波